

中国经济学家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预测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重新回顾我当初的命题,我觉得信心是增加的。当时我提出这样命题的根据是,经济学理论本身是简单的逻辑体系,用来解释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因此,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就是根据他所解释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如果现象越重要,那么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关系的理论,也就越重要。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是越来越好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的贸易国,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还排在十几名之外。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大约是美国的1/8,但是经济增长率这几年基本上是美国的3~4倍。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在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中国热”。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媒体,都以大篇幅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且国际上很多非常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都是到中国来的常客,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上述命题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理论创新的机会来自一些新的未被人认识的现象。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因为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解释。后来出现了滞胀,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学派,到了八九十年代,我们又发现货币确实是可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被新的理论,像新古典综合派所取代。从这种角度来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多用现有的理论基本上是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增长,连续十几年时间的增长,但是当时,主流学术界对双轨制是非常悲观的,认为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话,就应该推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休克疗法。Larry Summers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经济学家通常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但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大家有出乎预

料之外的共识。但是,中国1978年到1990年的平均增长是9%,1990年到2005年,每年是9.9%。同时期的苏联没有恢复增长,反而是崩溃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在2000、2001年,国外经济学界争论中国的经济速度是真的还是假的,原因是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间,出现了通货紧缩,物价每年在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是经济非常疲软,零增长或者是负增长,只有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才可以转变。但中国在1998年到2002年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因而认为,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一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的,顶多是2%,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但几年过去了,我想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预测,对中国很悲观的看法,做这些工作的人,都是主流经济学里的主流的经济学家。这些大师错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另外就是经济学有问题。应该说,教科书及主流文献上看到的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是有问题的。其实不仅是解释中国的转型现象有问题,再回顾中国当前最主要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我们再看看发展的理论,是不是就没问题?斯蒂格利茨教授讲,台湾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是因为台湾到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台湾,经济学家没回到台湾。而拉美是经济学家回到他们的国家,而工程师没回到他们国家,所以经济发展很糟。

经济理论也是发展的,但问题是现在的理论是不是真正揭示了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理由。现在最新的增长理论可能没有捕捉到经济发展和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比如说新制度经济学,看300年前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怎样,拿300年前的条件预测现在的经济。这样讲起来,发展理论实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些理论,实际上是不能解释中国当前很多的现象的。

我认为,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它不能用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它给我们很多理论创新的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比外国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的改革有优势。实际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对现有理论进行创新、作出贡献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我相信很有可能在21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会出现在中国。

但是把机遇变成现实,有非常多的挑战。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中国人学经济学是抱着经世济人的态度。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有两种情操,一个是救亡,另一个是图强。他们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西方经济学,希望学回来的“经”帮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但是现在取经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取回的经是不是真经,即使是的话,也可能不适用。仔细研究的话,绝大多数是不适用的。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成立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取回的经在西方是合适的,但是在中国是不是合适,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西方的经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经济学要真正对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对老师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人传统上会做的是把国外的理论拿回来进行总结,然后再重新整理一下。比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時候,我到哪一个地方,人家老让我介绍前沿,希望了解国外。这种教学和研究方式是不是合适?我觉得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是要帮助我们了解现象,预测现象,进而根据了解和预测来避免出问

题的话,老师必须真正深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去了解这种现象,从现象的背后归纳、抽象,提出新的理论。

最近,“十一五”规划里强调自主创新,我觉得在科技上需要自主创新,在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跟任何社会科学都同样需要进行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可能教给学生真正的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

老师还必须了解任何现象都有不同的解释角度,因此也会提出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是互补的,有些是竞争的。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教的理论是对的,也必须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确实必须记住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教学生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教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

教学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要不要教理论,我觉得要教理论,但教理论的时候要强调这只不过是一种视角,这个理论不是真理。最重要的是教理性的方法。我认为,本科生学会了这个视角,变成观察问题的一种方式。研究生必须前进一步,除了视角之外,还应该训练他们有能力用这个视角来观察现象,把现象归纳抽象,然后把他的观察、把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用严谨的逻辑表述出来。最好能够建立数学模型来表示。另一方面,任何理论模型都只是一个教学,任何一个现象只要能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就可以用无数多的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因此理论之间是会相互竞争的。必须教会学生索取今天的数据,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跟别人的理论。

我对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充满了信心。一方面,时代给了我们机会,另一方面则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学要在国际化过程中讲本土化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想结合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就中国经济学教育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中走向世界的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程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入,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已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在这

样的变化之中,产生了各种效应。虽然大家可能对这样的效应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学教育还是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的程度。其理由可能有以下几点。